

从人口科学到人口治理的教育人口理论^{*}

肖绍明, 蔡雅芝

(华南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教育人口理论在从人口科学的科学主义向人口治理的生命成长的转变中进一步完善。人口科学通过数据、统计和科学知识等描述和把握人口、人口教育、人口与教育的关系、教育人口等概念和关系,提升教育人口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人口科学视域下的教育人口理论出现“见数不见人”、人的教育的缺失等问题。人口治理理论则运用政治经济学、权力理论等揭示和批判人口及其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人口等概念和关系具有的生产性、主体性、创造性等特性。同时,面对机器大生产和数字化生产时代教育人口的异化,我们需要实现从培养劳动力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对教育人口的规训和去主体化向教育人口的安全和主体化转变。教育人口理论旨在充分、合理、合法地综合运用人口科学的科学性和人口治理的价值性进行调节,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解放与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口;人口科学;人口治理;教育人口;权力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25)12-0017-11

人口是教育的重要基础、前提条件和影响因素。教育和人口的关系是教育的最基本关系之一。教育人口理论不仅科学研究人口、人口教育、教育和人口的关系,而且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研究教育人口的生命成长和意义实现。人口科学指导下的教育人口理论研究人口及其与教育的客观关系和规律,为教育的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人口科学视域下教育人口理论重视抽象化、数据化和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和人口行为,出现“见数不见人”的问题。毕竟,“人口”(population)是作为人(human being)的现实和具体的重要存在形态和基本概念,脱离不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而且,教育与人的发展直接、紧密相关,教育是否以人为出发点并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检验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治理(population governmentality)中,教育人口理论聚焦人口的价值理性和生命成长。与教育人口学相比,教育人口理论更注重教育人口的问题揭示、现实批判和理论审视,丰富和发展了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人学。

一、人口科学中人口、人口教育和“见数不见人”

“人口”概念是用类、种等范畴准确描述、科学分类和抽象把握人的含义的产物。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这种研究人口的科学,以及相应的人口教育随之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和教育的进步和发展,也产生人文价值缺失的问题。

^{*} 收稿日期:2025-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HA200160)。

通信作者:肖绍明,博士,教授,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和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 人口科学中的人口和人口教育

人口科学是研究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迁移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了人口统计、人口预测、人口政策等多个方面。人口科学成为人口学的主流,甚而,在实证科学主导的时代,它几乎成为人口学的代名词。“人口”的原意为聚集在一片土地上的一定数量上的人,即“人群”,它既是现实的概念,也是观念的概念。在观念中,“‘人口’是一个包含着多种要素的综合范畴,如人口具有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迁移等等因素”^{[1]77-82}。而且,“人口”概念关涉人口生理素质分析与量化、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殖健康、妇女发展、贫困人口、城市化评定与竞赛指标、人口生理素质分析与量化、人口投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人口管理等人口状况,以及作为人类行为的人口行为,包括生育行为、死亡行为、迁移行为和社会行为等,并有独特的人口行为的种类、属性、特征与模式^{[2]15-18}。在现实中,马克思重视物质生产对人口及其自身生产的影响和作用,提出人口生产理论。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人口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例如,在封建制国家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国家经济、军事力量增长的基础。在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人口被视为生产力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治理中,人口则愈发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它总是和环境变化、历史变化、经济变化、社会变化等诸多条件联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学中,人口是人力资本的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人口被称作“人力资源”,简称“人力”。人的知识、技能及其社会、经济效用则是“人力资本”。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可以将自然形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教育通过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进而增加学生未来的收入,提升劳动力人口适应未来就业形势变化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投资^{[3]23},人力资本是教育投资的结果,是“一种存在于人体之内的,可提供未来收益的生产性成本”^{[3]42}。概言之,人口既是一个抽象概念,体现人类群体的量、质、关系和模态等方面的属性,是对人的群体进一步的抽象,也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概念。狭义上人口指自然属性上的人口。广义上人口包括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属性的人口。当然,它无法涵盖人的全部属性,不能把人口和人、人类、人力混淆,人口并非“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和“社会生活的主体”^{[4]1-5}。

从“人口”概念的发展史看,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中提出,一个理想的国家是能够维持合理人口数量并不超出限制规模的国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人口原理》中指出,人类的生育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土地生产是远远比不上人口生产的。马克思认为,现实中的人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社会人,人口不是单纯的统计学数据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5]102-112}。以后的政治经济学认为,人口是限定的,主要指国家的劳动人口,需要探究人口与资本、工资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当人口进入财富分析领域时,政治经济学就诞生了^{[6]96}。福柯(Michel Foucault)既没有从国家整体人口出发也没有回到人口,而是从具体情境下的具体人群出发,探索生命权力视域下人口治理机制的形成过程。在多种内涵的人口中,存在人口治理意义上的人口群体;驯服的人群和秩序破坏者是被排除在人口之外的,但在实践中,秩序破坏者并不仅仅是被驱逐和排斥,而是被“排斥并纳入”^{[6]54}。

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教育,即“人口教育”。从人口科学,也就是人口的事实性存在看,人口教育是“以人口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1]77-82}。从人口的价值性存在看,人口教育还应是以人口健康、和谐、幸福,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活动。人口教育是人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自然教育、社会教育、公民教育等,但受到这些教育的影响。在人口治理理论看来,人口教育必须了解关于人口的知识,一方面,人口知识是通过逻辑程序,乃至人口数据及其原理形成的;另一方面,人口知识不仅依赖于大量的客观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内含于权力的行使,并对权力的行使产生作用,它们包括政治经济学知识、人口学知识、社会学知识和历史学知识等等^{[7]11-14}。简言之,人口教育不仅包括人口科

学教育,而且包括对人口治理理论的学习。不仅研究如何将人口行为和选择编码成一套有理有据的人口治理知识和原理,而且为后续的教育人口治理提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合理性依据。

(二)人口科学中“见数不见人”和教育中“人”的隐退

人口科学中的“人口”主要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而非人文科学意义上的鲜活的、个性的、生命的人,它并不包括人性、人的本质等人的特有内涵。其与教育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口变量和教育事业的关系上,而非与直接的人的教育的关系。或者说,人口科学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科学主义视角下的人口科学在教育领域被单一化应用,将丰富的人口现象仅还原为可量化的变量,从而在教育实践、决策和意义阐释层面导致了“见数不见人”问题。进言之,在人口及其与教育的关系中,出现“人的消逝”,乃至教育中“人”的隐退与“人的教育的消逝”。在人口统计调查方面,人口调查是以统计学分析工具为准,获取“个体的集合”形式上的任一维度的数量特征。因此,人的集合和数量成为人口的特征,其中,丰富、完整、鲜活、具体的“人”(persons)不见了,出现“见数不见人”的现象和问题。人口数据知识的发展并非以促进人的个体幸福为最终的归宿,因为人口数据得以汇总的前提是消除个体之间的差异。虽然具体的、现实的人一旦被抽象成数据特征,具有生命意义和社会关系的完整性的个体就消失了,但是人与人口、人口的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是相互补充的。除了人口科学的人口分析,还需要从人口的价值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出发,看待人口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理解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人口是由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所构成的集合”^{[8]39-50},人口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集合,其内涵会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只有对影响人口变化的多种历史因素加以考察,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改善人的生存状况。

从人口治理角度看,人口的出场意味着人的生命权力成为主要的权力形式,权力不再以否定生命的形式表现自身,而是将个体的物理生命和人口层面的整体生命纳入了政治领域,展现出生产性的、积极的权力效应^{[9]38}。一方面,人口治理的出现,改变了“人口”的抽象性特性和数据化内涵,“治理的人口是和物质财富、资源、事件、气候环境、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相关联的复合体,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所针对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人口整体”^{[10]39-49};另一方面,“人口”实际上说明一种个体化权力技术的出现,对人的规训则增强了将个体纳入整体管理的力量效应。人口是非自足的,必须和其他因素如教育、惩戒、规训技术发生关系才能进入具体的研究视域。人以人口的形象出现,实际上表明了被治理主体的转变,人口维度的治理得到更多的重视,现代社会和教育治理正在基于人口群体这一现实建立一整套机制。“人口形成的过程,一方面是通过‘人种’,另一方面是通过人民所说的公众(public)。”^{[6]94}“公众”即人口治理的对象“人口”。进言之,现代国家从领土治理转向人口治理,其人口治理意义上的人口侧重于公众这一方面,公众具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习惯、需求和利益,这些都可以通过教育、经济、政治和法律来改变。“人口,就是这样一个延伸广阔的东西,从物种的生物学本源直到通过公众的概念所提供的可控制的外形(surface)。”^{[6]94}在教育和学校场景中,人口的教育代替了人的教育,也遵从了人口治理的逻辑。一方面,在应试教育中,考试是人口教育评价的主要形式。这种检查手段表明了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标准化、统计性、可见性,表明了现代教育及其学校系统作为知识转换器的作用。知识在师生之间流转,作为人的学生从教师那里学到知识,教师将学生客体化为人口科学意义上的人口,“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个体被引入了文件领域”^{[11]208-212}。另一方面,教育“记录者”将个体的行为和表现一一写进档案,成为人口数据。如果是出于规范化的目的,那么对人口的个案进行比较是不可避免的,这会引发一个疑虑:当人口个案变成认识对象的时候,完整的个体在哪^{[11]215-216}?进言之,人的教育被科学化的人口教育代替,“见数不见人”的科学化人口教育自然地表现为千校一面、千师一面、千生一面,从而可以模式化、标准化地进行教育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教育与人口之间的科学和治理关系

人口科学探究教育和人口之间客观的、经验的、工具的关系,为教育人口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指导。人口治理则把教育和人口的关系置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的教育人口实践中,为教育人口的规训、安全、主体化等提供了解释依据和发展理论。

(一)人口科学中教育和人口的关系

在人口科学中,教育和人口的关系是教育的基本关系,集中反映了教育与家庭、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人口的数量和教育的关系而论,在较为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状态下,“人口的数量决定着教育事业的可能规模,人口的增长速度决定教育事业发展应有的速度。反过来,教育又会影响人口数量的增长。教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1]77-82}。特定人口群体,包括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女性人口、学龄人口等,和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或客观条件^{[12]1-3}。人口科学和教育人口学研究人口如何推动或制约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一个国家人口的数量、质量、性别、结构、变化等是确定该国教育规模、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因素。人口素质和教育的关系包括以下两点。其一,人口素质包括个体的工作技能和知识储备,是国家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人口素质的提升离不开教育。因此,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在微观层面提升人口的认知能力和整合能力,为人口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和积极投身生产实践创造条件,而且在宏观层面,拥有更高教育素养的人口往往具备更高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更有可能直接参与研究活动,实现知识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其二,人口健康素质包括个体的健康和体能水平对社会生产具有重大的影响。人口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劳动参与率,在遭遇健康冲击时,人口的有效工作时长会缩短,有时会被迫提前退出人口市场。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质提升能减少儿童照料与老年照护的劳动需求,促使部分本应从事照护服务的人口转变为社会劳动力。同时,老年人口对少儿人口的照料,可以减轻育龄劳动人口的家庭负担,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13]22-39}。此外,教育和人口迁移、变动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日益受到重视,这要求教育主动适应人口迁移和变化的现状,重视宏观视野下学龄人口变动中教育资源的需求、分配和配置问题。

进言之,教育与人口的相互影响需要中介因素起作用,受到政治、经济、政策、环境、性别、技术水平、家庭、文化和受教育意愿等变量的影响。在当今社会,教育与人口的关系愈发紧密,这使得教育与人口的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人口规模和二维结构,而是开始向多维方向拓展^{[14]31-38},人口出生与死亡情况、人口变化趋势、资金投入、技术水平、性别平等状况以及生育文化传统等,都是影响教育和人口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人口增长过快,教育资金短缺,导致入学率和升学率降低,文盲率提高;人口数量过多,还会导致教育质量降低、人均教育投入减少和教育普及标准降低。而且,如果说“技术进步、性别平等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提升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15]36},那么教育和这些要素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历史维度来看,教育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这一现象始于工业社会。那时,国家开始大力普及义务教育。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形成在时序上是统一的。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特性在于其“超越了早期教育的狭窄利益,使其服务于整个国家”^{[16]译序}。教育与人口的相互影响需要中介因素起作用,人口接受何种程度的教育,是由社会发展状况对人口素质的需求决定的,同时也依赖于必要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14]31-38}。国家通过教育来改善人口的数量和素质,实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体现了人口与教育的间接关系^{[17]8}。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的治理模式主要是人口控制模式。它的前提是假设存在一个与本国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人口规模。目前,基于我国人口负增长的现实,人口发展理论亟待从人口控制模式转向人口素质提升模式^{[18]70-83}。与我国的人口治理模式转型相对应,教育与人口的关系应侧重于教育对人口发展的积极作用,发挥提高人口素质的功能,并将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优质

劳动力。当下,我国人口负增长,未来会出现学龄人口减少以及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此,国家须通过宏观的教育资源分配政策、生育政策来缓解教育资源与人口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人口治理中教育和人口的关系

就人口治理的机制而言,教育和人口之间的规训机制或关系是人口科学所忽视的。在人口科学中,资源、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和决定教育和人口之间均衡或失衡的关系,资本、规范、技术等对教育和人口之间关系的影响反映在人口数据中,它是科学的、价值中立的。例如,美国新自由主义者援引效用原则研究人口生产、子女教育等,构筑人口行为的可知性框架,为人口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事实上,在福柯的人口治理理论中,人口统计的科学是人口治理技术或者“规训”技术^{[6]10}。这种被规训的人口是“文化与财产关系的人类复杂联合体”。它不仅要求国家承担养护人口的责任,而且促使社会对人口进行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因此,在人口治理的“规训”技术下教育和人口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个人和家庭发展,而且能增强国家实力;而生命权力技术正是通过将个体生命与人口整体纳入管制,实现这一双重目标^{[19]102-106}。在此意义上,规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实现教育目的的辅助性技术。当然,大多数教育哲学家并不完全反对在教育中将规训技术运用于人口^{[19]137},比如,他们对考试这类规训化形式的批判,恰恰揭示了教育与其他检查手段的不同。然而,教育和人口之间的规训关系需要大众的积极反馈,只有这样才能催生抵制压迫性权力的意识^{[20]9-22}。

教育是人为地进行人口调节、推动人口变化和发展的调节器。人口因环境变化而发生的自发的调节被称为人口的现实,人口的自然性则表现为人为地进行人口调节的各种策略和技术。人口现实建构起来的社会自然性为人口治理和教育提供了合理性前提。基于此,教育才会接受并且认同特定的人口治理策略和方案。现代教育对人口的社会自然性的利用和研究表现为对环境要素进行控制和探究,进而研究和影响对人口的变动产生作用的偶发性事件的发生概率,以此实现养护人口、人口健康发展的目的。其中,教育对人口的积极作用依赖于量化的人口数据,但不能把冰冷的数据置于知识体系的最高地位,甚至把它当作人们对客观真理的判断标准。人口总是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虽然环境成为各种权力技术发挥生产作用的场域,但人口应该成为教育场域的主体,而不是冰冷的客体。作为生命的人口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改变自己的形态适应环境的变化。生命的常态比如健康和生死,被附加了价值判断而形成标准化的指征。人口教育中的各种权力技术,包括教育的规训和教化,目的是生产规范化个体,以及尽量避免发生对人口变动产生重大消极影响的偶发性事件。虽然国家理性为国家力量扩张提供了合理性,国家将自身发展视为根本目的,但在人口与教育互动的层面上,公共事务管理者与教育者所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调动人口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推动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共同发展。

此外,人口治理技术下人口的个体状况和教育的关系,是人口科学研究者相对忽视的一环。这一视角为重新审视人的发展,以及教育与人口发展的目的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从微观上讲,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口的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活动得以开展的最为基础的物质性条件是人口身上涌动的无限生命潜力,因为教育要实现超越物种生命、创造价值生命、促进每个人自我实现的积极目标。

三、教育人口的生命成长

教育人口是教育与人口之间关系“场”的主体,具有教育人口的现实性和社会自然性。教育人口的社会自然性是人为构建的,它为教育人口治理提供了合理性条件,也为教育人口的生命成长创造了积极条件。

(一)作为教育人口学研究对象的教育人口

教育人口学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研究领域,“是教育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拥有逻辑严密的学科体

系,未来发展前景广阔”^{[21]6}，“是与人口状况的变化有关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17]10}，“是以人口状况为背景、以人口各要素为出发点探索教育与人口相互关系并揭示相应教育规律的学科”^{[17]77-82}。教育人口学的人口研究中存在着是以教育学视野来看人口还是以人口学视野来看人口的争议。这两种学科视野下的人口内涵存在差异,人口学研究中的人口研究重视可量化的总体性特征,教育学中的人口不仅关注人口的自然的、社会的特征,乃至其抽象的、整体的特征,还重视组成人口的个体的差异性、个性和创造性等。教育人口学中最基本的关系是教育和人口的关系,其主要研究对象则是“教育人口”。当前,学界对“教育与人口”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对“教育人口”的分析则相对不足^{[12]1-3}。

在国际上,教育人口是指根据人口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对人口的一种分类。一般而言,“人口受教育程度”是对人口教育属性的描述,“教育人口”则指受过教育的人口^{[21]4}。广义的教育人口是指所有接受过和正在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人口,不仅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人口,也包括业余培训、社会教育人口等,而文盲和半文盲并没有被纳入其中。狭义的教育人口则指所有接受过以及正在接受不同程度学校教育的人口。就其类型而论,教育人口是人口群体中的一类,按受教育程度可分成大中小学教育人口、研究生教育人口,以及继续教育人口^{[21]5}。按受教育的需求,教育人口可分为独生子女人口、超常儿童人口、残疾儿童人口、青春期人口、老年人口、女性人口、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人口、贫困人口等^{[17]10}。由于教育人口研究的理论基础、学科意识、领域识别、研究反思等存在差异,因此,教育人口不是单纯的数量整体,组成人口的个人是具有多种规定性和关系(出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婚姻等)、包含多种要素(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迁徙等)的综合范畴^{[22]58-60}。

教育人口也是一个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概念。教育的本义是“育人”,对学前、小学教育人口而言,它意指“抚育”“养育”等;对中学教育人口而言,它意指“训育”“化(教)育”等;对成年人而言,它意指“职业教育”“自由教育”“个性化教育”“幸福教育”等。但是,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人口是受教育的劳动力,因为教育可以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决策有效性,进而增加个人的劳动报酬^{[23]1-17}。甚而,人力资本理论把作为人口行为的生育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纳入经济学的理性行为中,主张人口行为的“效用”在于:子女被视为一种“消费品”或者“投资品”,人们选择子女生育数量和教育是按照理性原则,力图达到父母的最大化收益。其中,子女的生育、养育是基础性投资,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则是后续投资^{[14]31-38}。同时,作为社会行为的人口行为,教育人口的现代化日益受重视,“人口现代化以控制人口数量、提升人口素质为出发点,涵盖人口再生产类型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现代化”^{[24]101-110}。

(二)人口治理中教育人口的生命成长

从教育人口的自然性、现实性到其社会性,是教育社会化、资格化和主体化的过程和结果。它们不仅为国家教育政策、人口政策制定提供调节教育与人口的关系的依据和可能条件,而且,需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以人的个性化发展为基础,深入教育人口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关注教育人口治理理念转变下的个性化发展和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数据时代的全景敞视主义通过时间控制、空间编制和数据建档,观察、记录与矫正教育人口,存在着忽视教育的育人本质、扭曲教育价值、导致教育人口“有数无人”的危险。但是,人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人口治理必然关涉人的发展和幸福。因为教育人口作为涌动的、整全的、有差异的生命存在,需要自己造就和发展自己,其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在人口治理中,人口是存在于特定时空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共同活动的,他们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并受到其制约的有生命的人的集合,而不是“经济人”“商品人”的抽象或集合。就教育人口而言,当教育成为国家的重要事业之后,教育人口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教育可以提升教育人口素养,具有将潜在的、单一的、机械的劳动力人口转化为现实的、多方面的、发展的劳动力的功能。但是,就从人口的诸多类别和人与人口的关系看,教育人口不是“杂多”个体的简单叠加和抽象。教育人口不仅与一系列的外在环境变量相关联(教育人口的生命自身蕴含着人的欲望或需求),而且从人口治理的角度

看,教育人口虽然难以逃离“被各种权力技术所渗透”^{[25]118-127}的命运,但人的审美化生存和个性化发展仍然是教育人口无法被“权力技术”规约或抹除的本质属性。

虽然教育人口作为人口治理得以发挥作用的载体,常以人口数据表现出来,但是,教育人口是人口的一个子集,教育人口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具有特有的历史性。在工业社会之前,生产劳动和教育相分离,教育与人口的联系并不紧密,教育人口仅限于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闲暇的富裕阶层。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大机器生产为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出现与教育人口相关的“相对过剩人口”。同时,受教育权成为广大劳工追求的权利,亦即,广大劳动者有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成为受教育人口的权利。一个物质生产和教育人口生产相协调,以及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制度和一个人力资本、人口治理的权力制度密不可分的时代到来了^{[26]441}。

教育人口的现实形态和素质是衡量一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指示器,承担着描述和预测教育事业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状况的责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权力之下,教育人口被档案化成人口数据,以效用为主导原则,最终可能导向一种无主体的幸福。但是,人的培养和幸福,以及人口治理是两个维度上的内容,人口不是“杂多”个体的集合,人的幸福和人口的幸福也不是一回事。在人口治理中,人口是一个具有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它不是由表象抽离出抽象的规定,而是从抽象的规定到具体的再现。人口总体无论是作为思想总体还是思想具体都是思维的产物,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为概念的过程^{[27]41-42}。进言之,人口治理和“杂多”的个体之间存在知识断裂,人口治理要通过安全机制来实现,而控制个体的是规训体系。在人口治理的安全机制中,一方面,以人口为政治主体是一个全新的发现^{[6]52},教育人口亦如此;另一方面,人口的安全机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例如,教育人口的受教育权受法律保护,教育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教育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教育资源配置来解决。这种人口治理的安全机制尤为重要,它使一个现代国家的教育人口不会因为教育资源的短缺而最终消亡,因此,教育资源紧缺犹如福柯在人口治理中所指的粮食紧缺,是一种幻觉,不是由于资源紧缺造成的,而是权力、制度治理的过失造成的^{[6]49-51}。在人口流入城市的教育人口猛然增长的背景下,将教育资源、教育环境、教育政策、教育质量、育人目的等诸多环节纳入综合考量,就体现了人口治理的安全机制和理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人与教育人口在治理上的“技术断裂”问题。也就是说,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教育人口治理存在人口科学和人口治理的逻辑上的不同,前者是“工具性层面”,强调教育人口的治理技术^{[6]52},后者是教育人口的具体价值和生存发展,也就是生命的成长和发展,强调和批判“以自由的名义实现了对整个生命过程的全方位介入和隐性干涉,从而深层次地造就了人们的无意识和对自由的幻想,塑造了当代社会‘自我投资、自我增殖的理性经济人’”^{[10]39-49}。

四、教育人口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口治理理论为教育人口理论研究提供了关注个体的微观视角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宏观视角,使教育人口理论研究立足于数字技术时代个体的生存境况,重新思考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口、人的培养与人口治理的关系和教育人口的目的和价值。

(一)教育人口的异化

人口治理是一种生命政治学,“从治理对象层面看,新的权力形式能够切中人口的诸多要素和关联性,进而在不知不觉中达到对整个生命过程的介入和管控。这种全方位管控生命的治理策略,是一种生命的政治学”^{[10]39-49}。人口治理理论中教育人口的生命权力技术是一种作用于生命的生产性权力技术,是在人口治理的安全机制之外的规训过程,包括监视、记录、考试等管理和评价教育人口的手段。这些无处不在的评比以及数字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将全景敞视变成现实,使教育人口成为“透明生命”,导致现代

教育人口的异化。教育规训技术通过操练、训练、管理等实现对教育人口的支配和形塑,强化教育人口的“被使用性”^{[28]3}。它只考虑迎合社会的需要,而忽视了教育人口的需求。规训技术盛行现象背后隐匿着一种教育人口观:由于教育人口的未成熟性和可塑性,他们无法理解教育目的,也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外界为教育人口设定发展的目标。这种教育人口观为“征用”教育人口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奠定基础^{[28]17}。规训权力的生产性特点在于它可以与各种规范化要求和教育技术结合,形成更加强大的权力。在规训之下,“个体既是受规训的,又是主动迎合的,既是被算度的,又是算度的,既是被谋划的,又是共谋的,个体共同筹划了生产过程”^{[28]25}。而且,在人口治理中,学校规训的主要对象是教育人口的身体,包括总体性的身体和具身化的身体,他们必须将与规则要求相符的行为具身化。也就是说,身体在规训中不过是教育人口行为的载体^{[29]32-36}。同时,学校规训下的空间安排对教育人口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包括对教育人口的活动范围的限定、固定的教室座位安排,以便其他人员对教育人口进行监视和检查^{[30]9-14}。

数字时代的规训呈现新形式。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步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规训向学校外扩展,数据身体取代生物性身体成为人口主体。以智慧课堂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学校教育,这种智慧系统将教育人口的学习状态转化为数据。它对声音、感觉和情感进行编码,即使是生物性身体,也就是教育人口的物质性和自然性部分,也逐渐被数字编码所消解。这样,教育人口拥有虚拟的身体,进行数字时代的人口再生产,并成为一种新的人口形式。此时,虚拟身体成为被分析和研究的对象,生物性身体在无形中被弱化,甚至可能演变为数据控制之下的傀儡^{[31]33-42}。同时,教育人口的行为和状态的信息被采集、编码和分析而进入教育测评系统,数据成为评判教育人口学业成就的客观依据。现实中的教育政策选择和教育行为以大数据教育测评为导向,教育测评成为数字权力生产和运作的载体。学校变成教育人口被生产和生产、生产和再生产的“教育工厂”,生产出标准化规格的人^{[32]33-41},也就是量化的人口,它是“作为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的对象”^{[6]99}。

(二)教育人口的自由全面发展

教育人口的异化是指通过一系列规训的知识、话语和技术体系创造驯服而自由的人(口),并导致人的去主体化。因此,只有解放人、发展人,使人成为人,才能消除教育人口的异化。具体而言,如果将教育人口单纯作为统计学变量对待,复杂的教育人口问题就会简化为单一的数量特征维度的问题,教育人口发展和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就会陷入人口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等怪圈之中,教育人口发展就会背离育人目的、人的主体化和人的解放与发展等教育目标。概言之,教育人口发展问题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将教育人口视为劳动力培养、经济发展的要素和动力源,更应该将其看成关涉人的尊严、权利、发展和福祉的人口综合性问题^{[33]113-120}。当今,“人口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等现代性话语既是对“人的现代化”的描述和追求,也蕴含对人口的价值性,或者说人口的生命意义的追求,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为人口治理意义上教育人口的健康、幸福发展提供了宏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提到人的全面发展,用的是德语名词 Individuen(individuum的复数形式),不仅指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结果和内涵,而且专指《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亦即,必须以具体的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和条件^{[34]6-8}。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针对资本逻辑统治下劳动分工导致的人片面发展的问题,提出面向未来的,基于活劳动和自由劳动的活生生的、自由的、创新的人的概念。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不仅仅局限于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它还立足于哲学意义上完整的、丰富的、个性的人。面对社会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方法,而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一个完整的人完全地占

有自己的本质”,包括人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多方面发展^{[35]205-208}。如果教育目的仅限于将人培养成劳动力,就是将人窄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人口,这意味着个性在重复的机械化劳动中受到压制,人被更有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挟持^{[36]3}。

教育人口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指教育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系,解放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但又不是从个体身上抽象出来的人(口)^{[37]84-87},又指在宏观的人口治理中,完成对人口及其与教育关系、教育人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克服教育人口理论中的资本逻辑、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或者科学主义,乃至教育数字化过程中的“数字洞穴”,回归教育人口的价值性和关涉人的幸福这一终极目的,尽力改善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外在条件,提升个人的幸福能力^{[38]30-37}。换言之,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人口生产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人口治理的宏观层面强调人口的生产性和主体性,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既源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求,还源于人不断追求自身完善的主体性。即是说,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指人的完整发展,人的最基本的素质都得到发展,可以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还指人的和谐发展,人的各方面素质呈现出协调美;还指人的个性发展,人作为独立的、自主的、具有独特性的个体,个体的基本素质成分存在不同的组合,呈现不同的结构,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特长^{[39]3-8}。

从福柯的人口治理角度看,即使是人口科学意义上的教育人口知识,也都变成具有权力效应的话语,都是人口生存的艺术。也就是说,福柯人口治理理论从微观上阐释教育人口理论,更关注和探究教育人口在具体的、现实的教育情境中教育人口的构造性实践(*pratiques constitutives*)。虽然这些构造性实践的内部存在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对立,但教育人口理论就是为摆脱科学与非科学的对立提供依据和标准的。一方面,它通过对教育人口规训或异化的批判揭示、再现那些“不可见权力的生产”^{[7]17},包括教育数字化中教育人口异化,树立正确的、规范的教育人口存在论和发展观;另一方面,改变既有的教育人口研究方法论,通过教育人口访谈、叙事等质性研究,深入教育人口之具体的、个体的、处境的体验、选择、决定和责任,呈现教育人口的意义和价值世界。或者说,基于福柯的审美化生存理论,教育人口理论需要体现人口生存的实践智慧和个体艺术。从人口治理的目的看,教育人口的自然性得以被建构起来的基础是教育承担着提高个体社会地位、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从个体发展层面看,优质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分配,乃至今天的数字化资源需要遵守分配正义和平等原则,坚持能力正义、承认正义和实质正义,鼓励个体的自尊、自重和自信,助力教育人口的身心健康、人格完整和自我实现;从国家发展层面看,教育人口治理综合了教育人口的科学性、人文性和社会性,致力于人口素质提升及其产生的积极效益,关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人口的数字素质和数字素养提升;从学生、家庭层面看,教育致力于使“人口”成“人才”、成“人”。因此,教育人口治理必须立足于育人目的,致力于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并通过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

五、结语:兼具科学性和价值性的教育人口理论

教育人口理论并不排斥人口科学的科学性。教育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科学为教育人口研究提供了经验的、现实的和准确的事实和知识,是教育人口研究的重要的、客观的基础。同时,反对人口科学主导下极端的人口科学主义、“见数不见人”的人口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也就是说,教育人口理论希望将人口科学和人口治理进行综合,强调人口也是人,人口不是消极的、数字化的、冰冷的、“物化”的客体,而是具有鲜活生命的、积极生产和生活的社会主体和权力主体。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言,物种生命和政治生命都被纳入治理的范畴^{[40]57-67},人口治理也不例外。而且,人口治理是给人以“生活”“负担生命责任”和整全生命的权利,而不是把教育人口当作资源来控制和生产,也不是对人口、人口和教育的关系、教育人口进行抽象化、数据化和统计性分析,并直接干预和控制。进言之,人口治理理论中的

教育人口是人的生命成长、自由全面发展、尊享幸福的权利主体,关系着人口的福祉(benefits)^①。人口治理中人口和教育之间不是一种二元的、单一功能结构的和静态的关系,人口治理致力于追求教育的真理、幸福和正义,充分、合理、合法地运用权力进行调节以解放每一个人。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调节,它只能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6]61}。

参考文献:

- [1] 何齐宗,戚务念.教育人口学:一门亟待开拓的新学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2).
- [2] 张俊良.人口社会学研究对象再探讨[J].人口学刊,2007(4).
- [3] 舒尔茨.对人的投资[M].吴珠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4] 郭志刚.人口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有关问题的思考:关于“人口”定义的反思[J].南方人口,1998(3).
- [5] 李龙,陈佳鞠.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思想及其中国化[J].人口研究,2019(3).
- [6]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M].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7] 福柯.对活人的治理[M].赵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8] 林进龙,穆光宗.人口哲学的出场:人、人口与历史[J].探索与争鸣,2024(10).
- [9] 福柯.权力的眼睛[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10] 苗翠翠.“人口”的历史出场与生命政治学的诞生[J].哲学动态,2021(11).
- [11]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12] 周仲高.教育人口研究新探[J].江南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
- [13] 胡耀岭,徐洋洋.中国人口质量抵补人口数量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人口研究,2024(1).
- [14] 彭虹斌.教育与人口关系新探[J].晋阳学刊,2022(3).
- [15] 迪博耶.生育、人口与教育投资:家庭量化历史[M].郭永钦,蔡孟君,王凌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 [16] 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M].王春华,王爱义,刘翠航,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17] 田家盛.教育人口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18] 王军.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中国人口治理策略研究:基于历史性与反思性视角[J].治理研究,2023(6).
- [19] 马歇尔.福柯:个人自主与教育[M].于伟,李珊珊,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0] 刘永谋.福柯论技术治理[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21] 周仲高.教育人口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22] 戚务念.教育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J].南昌高专学报,2004(1).
- [23]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1).
- [24] 李化树,魏红梅,王雨诗.人口高质量发展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创新的耦合关系与内在逻辑[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5(5).
- [25] 樊熙奇.生命的自主极性运动:论福柯“治理术”概念中的康吉莱姆生命哲学意蕴[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
- [26] 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8] 金生鈇.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① 治理实际上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等,治理将作用于我们所称的利益现象共同体。参见米歇尔·福柯著《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9页、61页。

- [29] 顾聪. 学校规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破解:基于福柯规训理论视角[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22).
- [30] 岳河. 身体与时间耦合下的学校规训教育探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1).
- [31] 张家军,陈苗. 回归育人价值:数字全景敞视下教育规训隐忧的消解路径[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4).
- [32] 金生鈇. 大数据教育测评的规训隐忧:对教育工具化的哲学审视[J]. 教育研究,2019(8).
- [33] 林进龙. 习近平关于人口问题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J]. 理论探索,2024(1).
- [34] 俞吾金.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之我见[J]. 探索与争鸣,2002(8).
- [35] 扈中平. 教育目的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36]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37] 吴向东. 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解释[J]. 教学与研究,2004(1).
- [38] 扈中平. 教育何以能关涉人的幸福[J]. 教育研究,2008(11).
- [39] 扈中平. “人的全面发展”内涵新析[J]. 教育研究,2005(5).
- [40] 蓝江. 什么是生命政治[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Educational Population Theory: Transitioning from Population Science to Population Governance

XIAO Shaoming, CAI Yazhi

(Contempora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population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as it shifts from the scientism of population science to a focus on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governance. Population science describes and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popul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education, educational aspects of population through data, statistic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reby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valid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population theory. Howeve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pulation science, educational population theory faces issues such as “seeing data but not people” and the lack of emphasis on human – centered education. In contrast, population governance theory employs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wer theory to reveal and criticize the productive, subjective and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s and relationships involving population and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alienation of educational population under industrialized and digitized pro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ition from merely cultivating a labor force to fostering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from the discipline and de – subjectification of education population to its safety and subjectificatio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popul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that effectively integrates scientific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science with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tion governance to regulate, genuinely liberate,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very individual.

Key words: population; population science; population governance; educational population; power

